

“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呐喊

—— 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原因论

郑春生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1960年代美国大学生既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学生权力”,也追求崇高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学生权利”,这是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 学生权力; 学生权利; 1960年代; 美国学生运动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4-0049-06

1960年代是西方民众广泛追求“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s)的年代。“黑人权力”、“学生权力”(student power)^①等口号众所周知,而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也此起彼伏。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奇卡诺人、同性恋者、土著美洲人争取权利运动,消费者争取消费权益运动及其他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交相辉映,相互促进。以我之见,1960年代美国学生确实在追求“学生权力”,但又不仅仅是“学生权力”,而是既包括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实实在在的“学生权力”,又包括崇高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学生权利”(Student Rights)^②。这是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内容。

一、为“学生权力”呐喊

美国在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时已经提出“学生权力”,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还只停留在口号上,直到1960年代学生运动高潮的到来。1967年8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佛瑞德·M·赫金杰的文章,他使用了《现在的口号是“学生权力”》的显赫标题^[1]。从此“学生权力”

收稿日期: 2007-09-18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06AIL0070105);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06年度研究课题(Z06042)

作者简介: 郑春生(1969-),男,安徽歙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196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

① “学生权力”一词1960-1964年在《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中分别出现了12次、2次;1965-1966年分别为4次、5次;1967年分别为20次、40次;1968年则高达97次、62次;1969年分别为88次、50次。

② “power”首要含义是指一种力量,即“能够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其次,它也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而取得一致行动,达到某种结果的能力。简言之,包括“行动权”(power to act)、“控制权”(power over)等。权利(right)是指被认为正当的权力,它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具有正当性;二具有有效性。两者相比,“权力(power)”相对中性,“权利(right)”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学生权利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学生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学生权力的获得。参见:王莉君. 权力与权利的思辨[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0-48.

成为与“黑人权力”一样引入瞩目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必须赋予学生一定的权力。“美国教育委员会 1968 年通过通信方式对其成员和其他教育者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家一致认为学生应该和将会‘在一些最重要的学术委员会有投票权’。”^{[2]219-220}

到底什么是“学生权力”?加州大学学生联合会在 1960 年代初就提出了行政权力 and 学生权利之间的不平衡,建议大学政策制定权从董事会和行政部门转移到教师和学生手中^{[2]174}。1966 年 12 月 19 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伯克利在学生权力方面落伍了》的报道,其中把“学生正在他们学院和大学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参与的要求”称为“学生权力”^[3]。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说服理由,什么样才算是一所大学”的讨论中,一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指出,他们“所有一切考虑的都是权力”,并称“你们现在拥有权力,我们想要得到它”^{[4]320}。哈佛大学学生主办的报纸《深红》(Crimson)的主编约耳·R·克拉姆的文章对“学生权力”的概括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学生权力’不意味着完全控制大学。它不意味着取消大学行政部门,或者剥夺大学全体教师的权力。在大多数大学里,行政部门和董事会掌握了大部分权力,教师掌握了剩下的权力。学生希望由他们和教师来分享大部分权力。”^{[2]219}

根据这一时期的媒体报道来看,美国学生主要是要求取得以下具体的权力:

第一,参与学校的管理。在美国 1960 年代以前的教育体制中,学校的管理者主要是行政部门或者董事会,学生通常被排除在外。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指出:“学生权利没有人倾听,他们无权参与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过度关注学校行政关于对外事务的处理,但却牺牲了更加重要的问题。”^{[4]292}更让学生不满的是,“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如大学董事会正“把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存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5]。因此,学生反对专横的律令,要求参与学校的管理。他们在《加州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些规章制度的权威已经被社会委托人正当地剥夺了。在一个学生共同体之中,权威的源泉是学生,而不是大学行政部门。”^{[2]173}弗兰西斯·法尔维在 1952 年时就要求满足学生合理的“权力”要求,成立学生政府,因为“在大多数大学里,学生政府将最充分地表达学生见解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即在大学政策制定和大学运转问题上,他们能表达自己的声音”^{[2]163}。自由言论运动成员罗伯特·斯塔罗宾说:“我们的观念是大学由教师、学生、书本和思想组成的。按照字面意义,行政部门仅仅是确保人行道保持清洁。它应该是教师和学生的公仆。我们希望大学重新民主化。虽然课程的安排无疑地由教师负责,但是学生应该能够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教师。”^{[2]216}学生运动领袖马里奥·萨维奥宣称:“除了学生,没有谁能够代表学生讲话。”^{[2]217}赫金杰一段话更明确地表述了学生的要求:“学生参加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从纪律委员会到课程编制委员会,甚至大学校长的选举——的趋势正在取得动力。越来越多的机构建立了涵盖整个大学范围的讨论会和大学评议会,其中包含学生的代表。”^{[2]220}

第二,师生平等交流。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日渐疏远。因为“他(指教师)主要的兴趣一定是在研究,因为这是他赢得学术圈名声的资本,同时也和他的工资等级直接挂钩。造成这一事实不仅仅因为他的商品、知识或专门技术通常能在市场上取得一个好价钱,还因为对学识的尊重已经被扭曲为一种迷信,集中体现在‘出版或死亡’的学说”^{[2]126}。由于对科研的极度重视,教师忽视了教学,特别是本科生教学。贝尔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教授由于既要上研究生演讲课,又要主持研究主题的研讨会,根本没时间从事本科生教学,只能让研究生助教来上有关演讲、集体讨论和测验工作的课程。虽然研究生

“在他们最近的研究工作的特定领域里拥有详尽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资格讲授需要广博知识的教育课程”^{[2]127}，本科生即使有幸见到教授，也难以与之交流。伯克利大学的情况非常典型：“班级很大。你肯定不会觉得你离教授很近，因为他们露脸时，其讲台高高在上，远离我们。如果你幸运，在人山人海，你能在教授面前露一下脸；如果你不幸运，你只好从隔壁房间的电视里一睹其尊容。”^{[6]91}因此，教授们不仅很少承担向本科生传授知识的任务，而且很少与本科生交流，远离他们的生活世界。罗伯特·S·莫里森在《现代大学》系列论文的导言中，指出了这种疏远：“许多最好的人与学生‘联系’的时间一周只有可怜的三个小时。这些学生一定是在研究所里。在这里教授们还得匀出一些时间听哲学博士的口头报告，读硕士的学位论文。”^{[2]127}最好的教授尚且如此，责任心差的教授与学生交流的情况不言自明。其结果是：“教师对学生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冷漠。……一方面是独裁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是超然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互为补充。教师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说不出学生强烈关注的问题。”^{[2]222-223}因此，学生希望改变师生之间的冷漠关系，要求与教师进行更多平等的交流。

第三，要求男女生自由交流、学生自由穿着等。美国一些大学实行男女生性别隔离，或者对男学生访问女生宿舍时间进行限制。这引起了追求自由的青年学生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男学生冲击性别隔离区的事件。另外，一些学校规定学生必须规范穿着，这也成为学生抱怨的对象。

二、为自由和平等呐喊

1960年代美国学生不仅仅关注切身之利，还积极追求带有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利。这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

追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960年代美国学生追求自由又有其特殊的背景。二战以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展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社会日益变成为一台精密的机器。大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为美国工业的需要服务；它是一个生产某种工业和政府所需要的产品的工厂”^[7]。“大学的任务就是为社会这台大机器生产合格的零部件。”^{[6]87}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大学无视学生的人格，只是“把学生生吞活剥地吃进来又直接把他们吐出去，从未考虑过他们的潜在能力”^{[4]302}，结果，“大学成为社会的工具，或者，以美国为例，大学成为那些统治这个社会的人的工具”^{[2]218}。

但大学生绝不愿意成为冷冰冰的机器上的螺丝帽，成为机器的奴隶；绝不愿意被科层化的大学和社会控制，沦为大学和社会的工具。他们要求社会重视他们的人格，要求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哈珀》编辑约翰·费舍尔指出：“他们追求我们过去所说的‘自由教育’。二十年前他们在大多数好的大学里都能找到这种‘自由教育’，但今天找到的可能性却几乎为零。”^{[2]142}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思想落差，1960年代的学生热衷于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反主流文化，甚至，“服用毒品成为了质疑社会过程的一部分”^{[8]200}，“与反主流文化相联系的性自由体现出了隔离的消除，它意味着跨越界限的自由，以及从性的角度去接触他想接触的任何人的自由”^{[8]180}。正由于大学生全方位地追求自由（甚至可以说是个人自由至上主义），1960年代被认为是最自由的时代。

平等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大力倡导的理念。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近代以来却一直推行精英教育，一般人是无法享受这一“特权”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具备了经济基础。“受教育是每个人来到人间的人的绝对权力”^[9]逐渐成为共识。于是，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追求的目标。但是美国高等教育在迈向现代化时却

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

首先是黑白不平等。尽管黑人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在发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900年的1700人上升到1970年的52万；25-29岁年龄组中完成四年及四年以上高等教育的黑人比例1940年为1.6%，1970年上升到7.35%^[10]，但黑白差别仍十分明显。1950年，黑人完成4年或4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只有2.1%，全国平均比例为6%。传统黑人院校主要集中在南部，规模小，人数少，条件差。1965年，全美123所黑人高校中，有119所位于南部和哥伦比亚特区。绝大多数的学校注册学生都在千人以下。1967年出版的《黑人年鉴》所统计的114所传统黑人高校中，有18所的注册学生不到300人，还有2所学校的人数分别是22、55和77^[11]。许多黑人都愿意选择白人为主的学校。连黑人都不愿意去的高校的条件可想而知。黑白之间最不平等的是种族隔离。1954年以前，美国法律允许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认为隔离但平等。但隔离何以平等？尽管1954年高等法院宣布种族隔离违宪，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并没有从种族偏见中解放出来。虽然这种情况在1960年平权法案之后慢慢有所改善，但至今也未完全解决。

其次，男女生之间的不平等。首先是在入学人数上，1950年，女性在各类高等院校里接受教育的人数比例远远低于1940年，只相当于1910年的水准，1940年女性本科生的比例是40%，硕士生38%，博士生是13%，而1950年分别下降为24%，29%，10%^[12]。女大学生毕业去工作，报酬远比男人低，而且差距在拉大。“1959年，妇女挣的钱是男人的66%，到1968年，这个数字则降到了58%。1970年的统计数字说明，女大学毕业生所得到的年平均收入可能比一个小学毕业的男人的钱还要少。”^[13]更可悲的是，连1960年代寻求解放的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中也充满着不平等。因此，很多女性都像SDS成员拉普（Rapp）那样意识到，男女不平等“是整个文化的问题，可能是人类文化的问题”^{[6]299}。于是，她们超越学生运动，参加了明确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

再次，不同院校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从选择大学那一刻就开始了。从表面看，高中毕业生的入学选择机会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但“在美国2000多所高等院校中，大约只有7%是大学，至于名牌大学，仅仅只有1%”^{[2]115}。进入名校还需要交纳高额的学费，因此，学生家庭的经济地位、文化底蕴等都将对选择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最终不是由学生选择，而是由制度选择”^{[2]115}。政府在教育科研经费上的不公平分配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据统计，在60年代初期，6个主要大学及其附属的研究中心得到约57%的联邦科研经费，另外14个大学分得22%。这样，联邦用于项目研究的经费将近有80%集中到了20个大学手里，而全国约有2000个高等学府。”^[14]结果是一些条件极差的院校的学生强烈不满。波士顿的萨克福马学院、北达科他大学和宾州马绍尔大学的学生就因此而造反。

三、为正义呐喊

美国教育一直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思想：美国是伟大的国家，是代表正义的。圣弗兰西斯科州立学院的学生领袖约翰·莱文说：“我们接受的教育使我们打心底里相信美国是为正义而战的。二战使我们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6]11}在南加州长大的杰夫·琼斯也回忆说：“在小学时，老师教导我们：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国家。”^{[6]16}在这种思想熏陶下，学生特别渴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在1960年代那个“为了玫瑰，而不是为了面包”的理想主义时代，学生的思想尤其如此。他们几乎本能地从道义的角度出

发，从理想主义出发，关注着美国和各种社会问题和内外政策，关注公平和正义。这正如哈佛大学 1965 级学生费恩·列为恩所言：“在熠熠生辉的黄金时代，我们梦想着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美好世界。”^{[4]278}但残酷的现实使学生不得不对“美国代表正义”产生了质疑。

首先，从国内问题看，虽然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之下，在 1960 年代进入了丰裕社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等现象仍然很严重。“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在破纪录地增长着，但全国仍有 1/3 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绝大多数人则认为起码有 20%-25% 的人处于这种状况。”^[15]至于种族主义问题，则是路人皆知。政府还常常对进行和平斗争的黑人及民众采取镇压措施。许多青年学生因此走上反抗之路。斯沃塞茅的女生凯茜·威尔德森说明了她参加运动的原因：“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正义。学校里有不正义的行为，城市行政部门有不正义行为，我们公开为此进行斗争。”^{[6]64}

其次，从国际角度看，学生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美国为正义而战。但是越南战争使以往的说教一下子失去了可信度。由于电视的普及，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画面生动地看到纷飞的燃烧弹、炸弹，大量的坟墓和处决，看到一个军事和经济实力十分强大的国家欺负一个人口稀少的不同种族，是美国人正把生机盎然的越南变成不毛之地，并称之为和平。这种对西方自我宣称价值的公然否定行径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在 1968 年前的十几个月或更早一些，西方左翼学生运动表达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反对美国对越南进行战争”^[16]。圣弗兰西斯科州立学院学生领导人约翰·莱文这样说：“伴随着在越南的恐怖战争，我有一种自我意识背叛的感觉。记得在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听战争报道，第一次关于轰炸的报道，我哭了。越南是催化剂。”^{[6]11}伯里斯·扬也说：“你能在课堂上辩论济慈，但是说到深处，你却对越战和塞尔玛担忧。”^{[4]298}

相比西方其他国家的学生对越战的感受，美国学生更具切肤之痛。首先是许多大学的很多研究项目受美国政府部门或与战争相关的企业，如道化学公司资助；其次是美国军队要到大学招募士兵到越南打仗，从而使许多学生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威胁。于是，学生纷纷抗议说：“办大学的目的是为谋杀者提供空间，并征募其他人加入到谋杀者行列。”^{[4]300}1965 年，美国对越战争升级，征兵人数开始大量增加。这年夏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将 125 000 名美国士兵送往南越，并将军事预算翻了一倍，而且不准学生延期入伍。这大大刺激了学生运动的发展。SDS 成员雷纳·拉普说：“对于我来说，是在 1965 年才把所有这种有关美国价值的华丽的词藻和我们真正在做的事联系起来，才把民权和越南战争联系起来。它对内镇压少数民族，对外轰炸另一种族和文化的农民，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6]100}伯克利自由演讲运动成员帕姆·布赖尔回忆说，“我们三四年都生活在征兵的阴影之下，不清楚如果进监狱会怎么样。”^{[6]106}结果，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反越战运动迅速升温。学生运动则高潮迭起，就连向来以温和传统著称的哈佛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会促使美国领导人重新考虑越战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在各种反战势力的压力之下，尼克松执政时期被迫调整对越政策，逐步结束越南战争。

四、结 语

学生渴望得到权利，而大学却往往忽视、甚至压制学生的要求，从而导致学生采用激进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曾任校长的哈罗德·泰勒指出：“要么结束战争，要么改革陈旧的课程，要么承认学生权利，要么认真地重视学生，要么采取反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公正的立场。如果大学和它现在的领导层无力采取行动，完成其中任何一种任务，那么严肃的人们对抗议和反抗除了默许

之外还该做什么, 学生或任何一个人还该做什么?”^{[2]234-235} 正因如此, “他们决定即使他们不知如何拯救这个世界, 即使他们没有灵丹妙药, 他们也必须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2]171-172}。即让人们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疾呼; 听到他们追求自身“学生权力”的疾呼!

参考文献

- [1] Hechinger F. Now the Slogan is “Student Power” [N]. New York Times, 1967-08-27(E11).
- [2] Elvin A. The Student and the University: A Background Book on the Campus Revolt [M]. New York: Parents' Magazine Press, 1969.
- [3] Trombley W. Berkley Lagging in Student Power [N]. Los Angeles Times, 1966-12-19(11B).
- [4] [美]理查德·诺顿·史密斯. 哈佛世纪: 锻造一所国家大学[M]. 程方平, 译.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 [5] [美]威廉·曼彻斯特. 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第4册[M]. 朱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450.
- [6] Ronald Fr. 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7] Berkson I. Theories of Americanization: A Critical Study: I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59.
- [8] [美]理伯卡·E·卡拉奇. 分裂的一代[M]. 覃文珍, 蒋凯, 胡元梓,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9] [美]S·E·佛罗斯特.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 吴元训,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468.
- [10] 屈书杰. 美国黑人教育研究[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 301.
- [11] Harry A P, Roscoe C B Jr. The Negro Almanac [M]. New York: Bellweth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478-504.
- [12] Sapiro V. Women in America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women's studies [M]. Boston: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3: 15.
- [13] [美]洛伊斯·班纳. 现代美国妇女[M]. 候文蕙,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7: 248.
- [14] [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 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M]. 许季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10.
- [15] 马骥雄. 美国教育改革[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432.
- [16] Patrick S, Maureen M. French Revolution 1968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 82.

Revolt for “Student Power” and “Student Rights”

—— On Reason of American Students Movement in 1960s

ZHENG Chun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1960s pursued “Student Power” related to their benefits and “Student Rights” concerned with their noble ideal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justice, which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and contents of American Students Movement at that time.

Key words: Student power; Student rights; The nineteen sixties; American Students Movement

(编辑: 刘慧青)